

环境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历史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品评

米善军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以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探讨了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揭示了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中心向四周发展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与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比较,两部著作在叙述体裁、论证手法和立意主旨等方面均存在鲜明差异。环境史撰述具有宏观、微观、区域叙事兼备的特点,中国环境通史著作宜采用传统纪传体编撰。

关键词: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 环境变迁; 环境通史; 编撰体裁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021-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05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China: Its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

MI Shanjun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China: Its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 by Robert B. Marks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hanges with a long period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process of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ith the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by Mark Elvin, clear differences are found for the some aspects such as narrative styles, argumentation techniques and themes. Because of the features of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views and regional narration, the biographical writing style is fit for Chinese gener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Key words: Robert B. Marks;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changes; gener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 genre of compilation

马立博(Robert B. Marks)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是第一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性著作。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的成果,该著作的出版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國环境史学的思想理论、研究方法、问题视角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利华在该书《序》中认为作者在问题意识、叙事方法及思想观点上颇具新意,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书中存在的些许不足。关永强、高丽洁在《译者前言》评析了书中提出的相关观点,对比了马著与伊著(即伊懋可《大象的退

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在观点上的不同,但未进一步讨论该书内容。陈华文评价了马立博敢于突破传统叙史模式,以环境变迁视角切入观察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但没有揭示出马氏笔下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与特点。^[1]总体来说,当前学界对该书的理论、方法、内容等评论较少,分析不足。基于此,笔者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梳理、揭示马氏笔下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及特点,并将该书与伊懋可《大象的退却》比较分析,从编撰体裁选择上提出编写中国环境通史专著的想法。

收稿日期:2017-03-14

作者简介:米善军(1994—),男,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

一、马氏笔下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与特点

(一) 马氏笔下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环境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四千年前的中国曾是地球上生物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如今这片广袤土地上数以百计的物种濒临灭绝。“一开始,人们只是为生计而狩猎或从森林、草地或湿地中采集食物,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约一万年,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扩张,森林让位于农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自20世纪以来,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与退化”^{[2]1}。

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勾勒出中国环境退化的历程:新石器时代以前,中国人为了生计而向自然索取其所需要的能够维持生存的资源,这一时期,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非常之小;大约一万年,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趋紧张,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的征服历程——从上古到帝制中期,北方的渭河流域、黄河流域率先开发出来以供持续不断增加的人口,伴随的则是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黄河频繁泛滥改道等一系列影响;从帝制中期至帝制晚期,随着北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地区得到充分开发,大量的山地丘陵被开垦出来,南方的经济由此开始超过北方,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从帝制晚期至近代中国,中国人又将视野投放到帝国东、西、南、北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从近代中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将资源的需求利用的目光投向了域外(太平洋、西伯利亚、美国西海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飞速发展,在经济发展大于环境保护的发展意识下,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二) 马氏笔下中国环境变迁的特点

笔者从马著中所叙述的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历程得出中国环境变迁具有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中心向四周发展的鲜明特点。这三个特点是随着历史时期中国人开发、利用不同空间的自然资源而呈现出

来的。

由近及远是指中国环境变迁呈现出由北向南的趋势。这一趋势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政治状况、人口南迁密切相关。魏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皆在北方,南方开发尚显不足。伴随着气候逐渐转冷、中原政局动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各自的政权。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原居民为躲避战乱,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浪潮,使得南方地区得到初步开发,但对南方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对较轻。而宋金、唐末、明清之际均是中国历史上气候转寒、政局动荡的时期,北方的人口持续不断的大量南下,对南方的开发愈来愈充分,使得南方的经济地位超过并领先北方,代价则是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损害。

由中心向四周是指由核心聚居区向边缘地区的开发。无论南北方,在帝制晚期能够适宜人们居住的地方基本都已经涉足开发。而为了解决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满足人口繁衍的需要,不得不以现有聚居区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寻找新的居住区、农耕区。因此,从前从未涉及或涉及较少的边疆、岛屿及山区成为人们的目标。比如,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曾是禁区,禁止外来人口对祖宗之地的破坏,但在人口的压力下,清朝政府最终还是放宽了对东北地区的管理。随着移民进入,东北的动物被大量捕杀。另外,边远的云南地区,由于移民的进入,则出现了大规模开矿、种植茶树等现象。

由内而外是指由国内向国外的拓展。马氏认为“随着19世纪大面积环境危机的出现,对资源的需求开始产生了全国性的生态影响。而且,这种生态影响也逐渐扩展到了国界以外的地区”^{[2]291}。近代以来,在太平洋群岛中欧的檀香贸易,在西伯利亚中俄毛皮贸易,在印度中国与欧美的鸦片贸易,都对国外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作者将国外其他地区的一些生态破坏皆归结为中国的资源需求,并且闭口不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追逐资本利益的刺激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掠夺各种自然资源给中国带来严重环境的破坏,这样的论述显然有失偏颇,甚至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二、马氏与伊氏著作的比较分析

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和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都是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但其在叙述体裁、论证手法与内容主旨具有鲜明差异。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二者评析,以加深对马立博著作的进一步理解。

首先,两书叙述体裁差异明显。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典型的编年通史性质的专著,而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专题性质的著作。

马立博采用通史编年的手法组织内容,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我希望这本书也能被非专业人士接受和理解,为此就要遵循比较标准的编年史和历史分期的方法来组织材料。其次,在这种框架下叙述中国环境史也便于我们借此来探讨环境变迁与标准历史叙述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评估人类活动对于中国环境的影响”^{[2]12}。通观全书,作者依据长时段的研究视角,由远及近纵向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环境变迁情况。其优势在于:一是深入浅出地完整呈现出中国环境变迁的整体面貌,凸显出作者一贯的长时段研究理念与学术思路;二是本书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可以满足不同知识层面读者的需要。不足则是:由于中国环境史所涉及问题之广、之深,因此,作者难免会疏忽遗漏其重要内容。比如作者在著作中较少涉及环境史研究中的动物变迁史、环境疾病史、环境灾害史等内容,只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这难免不是该书的遗憾之处。

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在内容组织上则采用横向专题研究的方法,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个专题,暗合了美国学者唐纳德·休斯三层次分析模式法——对自然本身的理解、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领域以及作为独特的人类经历之象征的精神或思想层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四千年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基本历程,并弥补了马立博在著作中无法深入探讨的相关学术问题,如战争、水利、思想意识等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但其缺陷是无法使读者形成完整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脉

络,容易出现知识破碎化、脱节化的现象。不过,正如南开大学王利华所评论道:“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趋向,这两本著作似乎反映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两个逻辑阶段:前者(伊书)重在专题开拓,后者(马书)重在整体汇通”^{[2]2}。

其次,两书论证手法各具特色。尽管两书都是旁征博引,但论证手法明显不一。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马立博博采西方学者众家之论,“广泛参考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环境史及相关议题的大量论著,全书引用的注释超过一千条”^{[2]3},这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西方学界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动态。但作者在引用西方相关学者的学术观点时,并未加以仔细甄别,因此出现许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述。如关于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作者认为汉人对周边民族完全是铁与血的破坏与征服过程,而淡化模糊了两种文明友好交流、交往、交融的一面,可见其论述有失偏颇。不可否认,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确实存在战争冲突,但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来看,交流和融合是趋势与主题,否则也不会形成今日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而且值得指出的是马立博鲜有引用中国学者的学术理念以及中国的原始文献史料。笔者认为,作为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术著作,如果缺乏中国丰富的史料支撑及相关中国学者的观点,其学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在支撑其学术观点时,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这不能不说又是其书的另一缺憾。

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则在其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历史时期丰富的史料,包括经史子集、出土资料、诗歌散文、文人笔记、地方志等,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及对史料的整体把握与运用。但在引用相关历史资料时,却时常出现史实错误或牵强附会的解读。如其文中有“清列圣陵坐落于长城以北的一个封闭的山谷之中”^{[3]302},这一叙述显然有误,因为清朝历代皇帝陵墓均在长城以南,而不是以北地区。又如,作者在释读谢灵运《山居赋》一文中“丛台”二字时,认为其“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在赵国指的是合二为一;在楚国指的是五谷丰登”^{[3]354},而谢氏在原文注释中谈到丛台只是赵国建造的一个馆驿而已。因此作者的解释似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类似以上出现的谬误在很多章节之中皆有存在,亦需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辨别。

第三,两书学术理念存在差异。由于马立博与伊懋可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经历有所不同,因此二者所撰写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在学术思想与理念方面皆有较大差别。

其一,二者关于中国古代农业体系的发展与形成对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变迁影响的看法有所不同。马立博认为中国古代的环境变迁与农业帝国的建立息息相关,而近现代的环境变迁则与工业化的诉求与进程密不可分。其书中指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与小农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而伊懋可虽然也注意到了农业对中国环境变迁的影响,但他认为农业发展的最初动机是为战争提供更加稳固的资源。“在他看来,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机制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推动了历史变迁的进程,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有轻重大小之分,因而环境变化表现出了不同时代差异和地域特征”^{[3]13}。这与马立博主要强调的农业对中国环境变迁影响所占据的核心地位的观点有所不同。此外,马立博认为虽然中国的农业发展破坏并影响了环境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单一化现象,但是中国的农作制度却又有着非凡的可持续性,这是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伊懋可则认为中国经历着“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然而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从而形成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即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其二,二者在各自著作中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马立博在书中重点关注了历史时期“汉人”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的“汉人”自诩其文明程度领先于周边族群,也由于随着农田开垦、人口增加、生存压力扩大,其不得不向周边进行生存领地“扩张”,中原农业文明开始逐步向东、西、南、北不断“侵犯”,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强行纳入农业帝国体系之中,几千年来双方上演了战争、贸易、

和平等复杂历史剧幕。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关注中原汉人与周边族群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影响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但作者也许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认为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永远是血与火、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是我们读者必须加以分辨的。

伊懋可则在书中重点提出了“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观点——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较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阻碍了更好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人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兴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起初在防洪、灌溉、增加粮食产量等具有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护修缮这些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大,维修成本超越了当初的建造成本。书中指出,“因此,大型水利系统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它来说,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会引发新的问题”^{[3]162},而“人们不得不面对一种悖论。同样的一种水利技术,在上古、中古甚至帝制晚期曾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后来却逐渐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则阻碍经济结构的任何轻易的变革”^{[3]178}。

然而,虽然两书在学术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二者对中国环境发展却皆持有悲观失望的观点。马立博在著作中对中国环境变迁流露出消极的情绪。作者在书中结尾写道:“我也很怀疑近年来中国对于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呼吁能否制止——更不要说扭转——生态破坏的继续。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日益失去其恢复弹性,因此,土地、空气和水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留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面对共同的环境挑战,中国漫长的环境史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于中国或世界应对能力的期望。”^{[2]461}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虽然显得有些负面,但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勾勒的历史时期中国环境变迁的历程——中国的环境确实持续遭到了人的破坏。实际上,这一环境变迁历程的揭示对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环境亦即提升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均具有积极作用。当然,中国环境史并不是一部农业拓殖史、环境破坏史、环境退化史这么简单,它还包括与环境相关

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复杂立体的完整体系。王利华教授在马氏书中《序》里指出:“作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思想偏颇,深受西方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否是受了近年来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些论调甚嚣尘上,大有唱衰中国,遏制中国发展之目的。”^{[2]3}

同样在伊懋可的著作中也出现了类似论述。书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中国4000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因子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在伊氏著作的最后部分,作者将中国环境史置于更加广阔的视野之下进行讨论,与之前提出的“高水平陷阱”假说相呼应,从环境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近代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的事实。有学者指出:“伊懋可的用意既不是野生动物的历史变迁,也不是为了探究大象退却的真正原因,他的兴趣在于批判中国专制的发展模式,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无法有工业革命模式的突破。这与‘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调暗通款曲”^[4]。因此,对于两部著作中出现的这种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我们必须予以识别。

通过对比分析两部著作可以发现:马著长于整体描述、纵向贯通,短于横向挖掘;伊著长于专题拓展,短于整体贯通;特别是两人皆有较为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如伊氏一以贯之的“高水平陷阱理论”与“技术锁定”观点,马氏长期坚持的长时段研究理论视角。但需要指出的是,马氏著作在章节内容设置上还有所欠缺。众所周知,中国环境近现代变迁的强度远远大于中国古代,近现代环境变迁对我们当代的环境治理更具启发意义。但作为一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通史著作,马氏著作在章节安排上重古轻近(代),内容叙述上详古略近(代),因此这既是作者需要补充完善之处,也是我们着重加强研究之处。

三、中国环境通史著作编撰体裁探讨

(一)中国环境史学界未能推出环境通史著作的原因

中国的环境史学自20世纪80和90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迅猛发展,但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与范

畴、知识体系、指导思想、学科归属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仍然处于艰苦的构建之中,而西方国家在理论方面则已经相对成熟。这也许就是西方学者能够早于中国学者推出整体贯通的研究中国环境史学术著作的重要原因。正如王利华教授所说:“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仍处于分散探讨的阶段,已出版的几部上下贯通的著作,基本上仍是自然环境变迁史和环境保护史的框架而非综合的环境史著作,反不如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中国环境史著作能够体现系统分析和综合考察的旨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学者对环境史的学理构架一直没有展开讨论。”^[5]除环境史理论框架尚未建立,著作撰写体例不明亦是滞后中国环境史专著迟迟未能面世的重要原因。中国环境史涉及内容庞杂,若是没有确定撰写体例,环境史著作撰述只能停留在当前的专题探讨之中,难以推出整体贯通、详略得当的学术著作。

(二)中国史学著作常用撰写体裁分析

撰写中国环境史著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体裁的选择。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明确提出要重视史书撰述的体裁、体例问题,认为“史学遗产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写历史书,写历史书用什么形式表现最合适”^{[6]251},强调“内容是要紧的,但是如何表达内容,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适当的形式,就不能表达适当的内容。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6]236}。选择何种体裁来撰述中国环境史,当前并没有人对此提出看法。笔者试将传统与当前史书编撰体裁做一比较,以得出关于中国环境史编写体例的一己之见。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汗牛充栋的史书,编纂上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史学上习惯地称之为史书的体裁”^{[7]2}。传统史书体裁种类繁多,如:“旧目录家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其余史部的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凡十一门”^[8];“《四库全书》区分为十获类。梁自超《新史学》一书则分为十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二十三类。这多种体裁是各个时代的史家听创造灼”^{[9]14}。但总而言之,可以归为三类,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其每一

类都有各自的功用。编年体史书以年为主,它综合和借鉴了以前的记言、书事的记载形式,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时间的联系。但“编年体史书对能够确定时间的史事不厌其烦地记载,而那些无法记年的重要事实却被遗漏,特别是这种体裁无法大量记载各种人物,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历史面貌。这表明单线条的编年记事体裁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7]3}。纪传体史书是司马迁吸收、总结、创新先秦时期各类史书撰写体裁风格而产生的。它以人为主,“各种体例相互补充,在记事范围上大大超过编年体,反映出中国远古到汉代数千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和中外关系各方面社会历史全貌”^{[7]5}。然而,纪传体史书却有记事分散、读者难得要领且有记事重复的缺点。纪事本末本既吸收了编年、纪传之长,同时也弥补其短。它不受严格的体例限制,史家可以相对自主地选择那些对历史影响较大的史事,不但适合记载政治事件,而且各项典章制度、各类事件、各种人物、各派学术,都可以完整地记载,体例非常灵活。

以上是传统的史书编撰体裁优缺点分析,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史家则几乎都采用了西方的章节体裁来撰述历史。章节体相对于传统史学体裁较为灵活,不受体例严格束缚,史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撰写史书,可以深入论述某一问题,而章节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传统史书所运用的纪事本末同出一辙,其缺点是容易使章与章、节与节之间不连贯,难以形成完整体系。

(三) 纪传体体裁撰写中国环境通史著作的可行性

环境通史著作选择撰写体裁与环境史研究内容息息相关。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环境史著作采用何种体裁的撰述形式。关于环境史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的见解。其中周琼教授对环境史研究范畴作了细致、全面的论述,认为环境史“主要研究各生物要素及非生物要素及其系统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包括自然界生物、非生物与人类社会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探究不同时期环境变迁动因、特点、规律、后果、影响及各区域环境变迁的模式、趋势,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环境社会学、环

境人类学,系统总结及研讨其理论方法”^[10]。概言之,其包括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历史、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凝练环境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环境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不同论题四个方面的内容。因此,从环境史研究庞杂的内容来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都难以满足撰写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分明的环境通史著作要求。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纪传体较为适宜编写中国环境通史著作。

环境史撰述具有宏观、微观、区域叙事兼备的特点。所谓宏观叙事就是解决中国地域面积广大、环境状况复杂的问题,整体研究、把握中国环境变迁的规律、特点、背景、原因等方面内容。区域叙事则是弥补中国地理区域特征明显,从整体视角难以完全说明中国历史时期环境问题的缺陷,通过切入区域环境变迁来进一步深化研究各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环境问题。微观叙事是为宏观与区域叙事做实证工作,具体考察自然界生物及非生物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水、土壤、岩石、森林等产生、发展、变迁的历史。宏观叙事是主干,区域与微观叙事是分支,即源与流的关系。这一特点正暗合了传统纪传体史书的特点。传统纪传体史书以帝王本纪为核心,列传、表、志等为分支,共同支撑着史书的撰写,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环境通史著作可以中国环境史通论篇为核心,仿照纪传体史书的帝王本纪部分,按照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个时代环境变迁史,揭示环境变迁的规律、特征等。区域环境史篇可看作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部分”,其余则如纪传体中的“志”,分生物要素篇、非生物要素篇、理论方法篇等分门别类的撰述;将历史时期影响环境变迁的大事按照“表”的形式逐一梳理,还可适当地穿插历史图像,以增强历史形象感。这种既有总纲又有子目的编写体裁适合撰写中国环境通史著作。而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由于固有的无法反映整体历史规律、容易割裂事件之间联系的缺点,均不适合环境史著作的撰写。

环境通史撰述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术学科,以历史学为根本,融合了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医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因此撰写一部兼具学术与普及性、繁简适宜的环境史著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某一一人之力所能达到,需要不同学科与专业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才能做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是批

判继承传统史学中的纪传体体例,不仅继承其“形”,更吸收其“神”。所谓“形”是指纪传体史书的整体撰写框架,“神”是指确定一核心,其他分支补充、呼应、完善主干部分。传统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体例由于符合维护封建帝王的权威的政治作用,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沿用。而我们将其所特有的政治色彩剥离,汲取其精华为当代史学所用。传统纪传体史书编写亦存在记事分散、重复的缺陷,笔者认为中国环境史自身所具有的宏观与微观、区域叙事相结合的特征足以克服这一缺憾。因为不同史学观指导下的撰写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传统纪传体史书各部分都是围绕着儒家“大一统”史观,巩固封建皇权而撰写。环境史著作的撰述则结合宏观、微观、区域三大史观,既分工明确又相互结合,可避免记事分散、重复的问题。尽管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编撰体例尚未成形,但是中国学者具有占据史料丰富、文献功底深厚、区位优势明显、善于学习等诸多优势,相信能够在不久后推出内容综合的中国环境通史著作。

陈其泰曾谈到:“史书体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下功夫,努力做到既有正确鲜明的观点,丰富翔实的史事,又有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叙述形式。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分章节到底的编写形式,无疑还会继续得到应用和改进,我们的改造利用工作也决不局限在一两种体裁

之内……还可以批判地继承其他史书体裁,写出新的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史等专史。”^[9]¹⁸这一关于史学著作撰写体裁的论述值得环境史学人思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陈华文.天人合一自然观只留在纸上——《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N].上海证券报,2015-12-15(8).
- [2]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M].关永强,高丽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3]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4]李军.从大象退却看中国环境变迁[N].中国环境报,2015-11-19(8).
- [5]王利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前景和当前任务[N].人民日报,2012-10-11(23).
- [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7]罗炳良.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J].史学月刊,1997(5):2-8.
- [8]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J].历史研究,1987(1):129-135.
- [9]陈其泰.史书体裁应有创新[J].史学史月刊,1982(1):14-18.
- [10]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J].思想战线,2017(2):146-159.

